

中国特色社会学学术话语 体系构建的若干思考*

李友梅

提要:习近平同志在2016年5月17日的重要讲话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指出了更明确的方向。中国社会学正处于历史上难得的好时期,需要从更高的位置、更广阔的视野认真思考如何构建和发展自身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需要汲取社会学前贤在中国化和理论化方面的优良传统,在深入中国实际、总结中国经验、回答中国问题中,不断提升文化自觉和学科水平;需要增强整体合力和担当精神,主动为推进中国社会学自信地走向世界、让国际社会实际地认识和理解中国而发挥积极作用。

关键词:中国社会学发展 学术话语体系构建 文化自觉 历史担当

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简称“习近平同志讲话”),强调了发展和创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深刻分析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长远发展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并对新形势下进一步做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战略。可以预期,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即将迎来一个可以大有作为的新时代,中国社会学人要抓住这个大好机遇,立足中国社会转型实践,自觉担当起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学术话语的历史任务,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中国本土社会学发展面临新契机

习近平同志讲话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正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 本文的深入思考,得到了蔡禾、肖瑛、耿敬、张虎祥等老师的许多启发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的新的伟大征程中,迫切需要我们用贴切的新理论新方法来自来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面临的矛盾、风险和挑战,也迫切需要我们当代中国现代化实践的成功经验上升到规律性认识,进而转化成系统化的科学理论,为我们自己也为世界能够真正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为当代中国现代化实践提供有效的智力支撑。哲学社会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承担起这一历史使命,不仅需要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更需要从一个广阔的视角,在世界与中国发展的大历史中,对中国现有的哲学社会学科的学术话语体系进行反身性思考,只有这样才可能“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也才有可能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建设建言献策,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

随着改革开放的启动,社会学学科获得了重建机会,这意味着社会学研究可以为我国社会事业的发展发挥作用。但当时首要的任务正如1979年邓小平同志所提出的,社会学等学科“需要赶快补课”。对于刚刚恢复的中国社会学来说,一方面是注重学科与人才的建设,另一方面是针对中国实际问题,注重实地调查,自觉地将学科定位为“一门为人民服务的社会科学”(费孝通,1980)。1999年,在社会学重建20年以后,费孝通先生再次提出社会学要“重新补一补课”,这次补课是对社会学的理论和基础建设提出的要求,以提高社会学认识和分析中国问题的理论能力,跟上时代的需求。今天,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努力融入世界秩序、遵循国际规则之时,主导这一秩序和规则的西方世界又推动了后全球化的“逆流”,试图重新安排和解释世界秩序与规则(高柏,2016)。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社会转型正经历着深刻变化,前进中的问题、成长中的烦恼、转型中的困惑,都在人们的行为方式、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中打下烙印,人们思想的独立性、选择性、多边性、差异性进一步增强。一些错误思想观点竭力扩大自身影响,与我们争夺意识形态的解释权、话语权、引领权(董云虎,2016)。在此复杂背景下,中国就应该努力建构起自己的理论和话语体系,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式、新表述,推动国际学术界开展研究和讨论,并由此体现出运用自己的理论和话语体系与西方世界进行对话、沟通和争辩的能力。这样,才能以我们自己的理论和话语体系使世界认识中国,并对国际经济社会秩序和政策范式的重建产生重要影响。正因为此,我们有必要突破和完善现有学科体

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局限,将自己的本土化建设与走向世界结合起来。

费孝通先生在晚年提出“文化自觉”的概念,蕴含着通过更好地认识中国自身来认识世界、通过理解和认识其他各国的文化来更好地认识中国的意图。文化自觉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的“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在生活各方面所起的作用,它的意义、所受的其他文化的影响及发展的方向。但文化自觉不带有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同时也不主张“西化”或“全面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发展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费孝通认为,如果各种文化都自觉,这个文化多元的世界才能在相互融合的基础上出现一个具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形成一套各种文化和平共处、各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同守则。从他的思考中,我们也感到了中国社会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性。首先,我们要通贯古今中外,在具体情境中认识和理解中国、西方的历史和传统,并据此比较中西之间的差异和差距;其次,要重视结合中国的实际,通过反复的实践去认识社会生活的秩序和意义;第三,要紧跟历史和时代的要求,要回应人民和社会的实际需求;第四,也是最关键的,要建设系统的学科体系、包容性的学术体系以及既能涵盖中国特质,又能与世界其他文化相互沟通和连接的话语体系。这不仅是过去引领和支撑社会学建设的方针,也是当下我们进行新一轮高水平学科建设、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的要义。

习近平同志讲话指出,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探索,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我们体会到,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一方面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推进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建设,另一方面要加强与国外智库的交流,要聚焦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推出并牵头组织研究项目,增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影响力。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

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出去的境地。因此,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要不断地更新知识积累,不断提升学术水平,具备深刻洞察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实践变化机制的能力,而且要及时把握世界学术前沿的理论与方法发展走势,使自己在高水平的国际交流中具有实际对话能力。

二、中国社会学者立足转型实践的理论探索

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建设始终是各代学人奋力求索的。早在上世纪30年代,当社会学被作为一门救国救民的学科引入中国时,以吴文藻、潘光旦等为代表的第一代社会学家和以费孝通、林耀华等为代表的第二代社会学家就积极探索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路径。吴文藻和费孝通曾精辟地指出,中国社会学一定是“‘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的社会学”。潘光旦对“中和位育”的解释、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的提出、林耀华等学者对于中国本土社会的解释,都表明了他们在中国本土寻求可以构建理解、解释和拯救当时处在深刻危机和急剧变迁中的中国社会的学术范式和话语的努力。

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习近平,2016)。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也不断地碰到了如何才能深刻地认识社会转型的现实问题。

19世纪中期以来,以西方文化作为参照反思和重新认识中国文化就成为了华人学术界的永恒主题。就社会学而言,从老一辈社会学家一直到当代社会学家,都力图在与西方学术界的对话过程中,从中国生活实际出发,建构基于中国社会转型的本土实践的学术话语。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本土话语意识的体现,多是强调从中国的经验研究出发,注重中国的传统,并反思西方研究中国的理论中所存在着的简化与偏差,但仍未能提出自己的理论体系(黄宗智,2005)。西方研究中国往往是简单地将基于对西方社会变迁的历史观察所形成的分析概念套用在中国,而西方理论之所以大行其道,其根本还在于西

方学者拥有学术话语权(黄宗智,2007)。在西方市场转型理论进入到对中国社会转型的研究后,中国社会学研究者逐渐意识到忽视国家机制而单纯地以市场机制解释中国的社会转型,似乎不符合中国社会的转型实践。他们试图摆脱西方学术话语的支配,开始立足于中国社会转型的自身特征及其内在逻辑,并尝试性地提出了“渐进市场转型”、“权力继续论”的分析视角(边燕杰主编,2002)。与此同时,孙立平等开展的口述史研究也以逼近中国乡土社会的日常实践为使命,提出了“过程—事件”分析视角,可以说是我国社会学在方法论上走向本土化的一个重要成果(孙立平、郭于华,2000);相应地,张静(2007)提出结构—制度分析框架,同孙立平等人的分析框架形成对话。

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苏东各国的社会转型,以布达佩斯学派为代表的的话语体系也进入了中国学术界。中国社会学学者将之放到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发现,其对苏东转型研究所做出的理论解释难以应用到中国的社会转型上来,进而提出了基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实践社会学的概念(孙立平,2005)。谢立中(2007)多年来致力于构建有别于过程—事件分析和制度—结构分析路径的多元话语分析。特别是在总结和提升我国改革开放30年社会变化的经验和成果的过程中,社会学领域的创新更是层出不穷。李友梅等基于本土发展实践和经验的理论总结,由反思支配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范式开始,意欲超越“国家与社会”范式的理论想象,将改革开放30年来的社会变迁过程视为一个自主性不断生长的实践过程,不仅尝试性地提出了“制度与生活”理论视角,并进而运用这一视角重新解读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之间互相影响、互相认同又相互建构的过程(李友梅等,2008;李友梅等主编,2009)。李强对中国社会变革与传承的特点做出解释,将之归纳为政府主导社会、整体利益社会、关系社会、身份等级社会以及家庭伦理本位社会(李强主编,2008)。李培林首先以“中国经验”的概念来概括中国20世纪中期尤其是这30多年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实践及其内在逻辑,并对这一概念的内涵进行了多重解释,一方面呈现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包含了“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公正社会”等三种现代性价值的实践探索和深刻反思(李培林,2007,2008)。郑杭生(2012)从“实践结构论”的角度,将“中国经验”看作是中国社会上下结合、共同探索、互动创新的结果。

近些年来,中国社会学者们越来越注重方法论上的反思,比如针对

源于西方学术界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分析范式应用于分析本土实践时的二元性、片段性、简化论等问题(肖瑛,2014a),提出了不同的方法论创新。李培林(1992)强调,社会结构转型是资源配置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他专注于对非正式制度、关系性社会结构等问题的经验研究和理论拓展,由此形成了“社会结构转型论”并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渠敬东、周飞舟、应星等青年学者借由政治经济学所生发出来的社会学视角,从中国社会的路径和发展事实来解释中国社会本身发生的问题、特定的社会经济运行逻辑以及特定的社会矛盾与后果,分析了中国社会转型的内在逻辑(渠敬东等,2009)。除此之外,中国社会学者还提出从全球化背景下现代性发展的宏大视野中来审视当代中国社会经济转型,金耀基由此发现,国内外学术界越来越认识到非西方社会的发展实践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获得过程,正在呈现出“多元现代性”的格局(金耀基,2016)。那么,如何在全球视野中定位中国正在发生的现代性过程,也正在成为国内学者所关注的问题。

由此可见,在学科建设过程中,中国社会学人始终保留“社会学危机”意识,在理论、方法、学术话语体系、学术话语权的建设、拓展和反思上用力颇多(肖瑛、曾炜,2007;郑杭生,2011;吴晓明,2011)。可以说,反思性、批判性和建设性的特质是社会学学科得以绵延更新的源泉所在,但效果还是难尽如人民、社会和学界的期待。其中最典型的表现是,社会学的学术话语还高度碎片化,没有形成能够有效解释中国社会变迁的脉络、机制的整体性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这同上世纪早期社会学传入美国后就迅速形成一度影响世界社会学发展的芝加哥学派形成鲜明对比。除了西方学者拥有学术话语权(黄宗智,2007)之外,还有几个重要原因:社会学长达20年的消失造成其学术血脉的中断和人才队伍的断层;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在现代化过程中被边缘化;同前辈学人相比,新时期成长起来的社会学人对传统文化较为生疏和隔膜,造成了社会学研究中普遍缺失历史链条和文化接续;虽然国内社会学界能够提出一些原创性的概念,但是大多各自为战,并没有共享的研究问题,不是有意识地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文章浩瀚但重复堆砌甚多,难以促就真正的知识积累(周雪光、练宏,2011)。

近期,国内一批学者提出,构建社会科学的学科话语体系需要实现“历史转向”(肖瑛,2014b)和“文化转向”,这对于培育我国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中的主体地位具有现实意义。所谓历史转向,就是坚持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假设,基于中国历史悠久且具有连续性的事实,从思想史和社会史及其互动的角度,探寻中国社会变迁的中时段甚至长时段的轨迹、力量构成、具体机制和逻辑,探寻历史与当下的内在关联,从中国思想传统中找寻建构社会、解释社会的概念和理论,找寻从古到今中外理论和思想之间的接榫和转化的契机、机制和在制度和民情两方面的实际影响,并基于此来回答当下中国社会变迁的机制问题,来理解我国民情的变迁路向和原因。所谓文化转向,即历史转向中的民情和精神气质维度的彰显。钱穆先生强调中国这个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化意义上的,凸显了理解中国社会必须理解中国文化的根本特点、演化以及其在民众精神气质和民情建构和演变中的具体作用,以及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碰撞中所产生的新特点和新民情。需要提醒的是,社会学的历史和文化转向不是把历史和文化当作一种研究的工具和补充,而是强调其本体性地位。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看,历史和文化转向对于增强整个社会学学科在思维和研究上的历史感和经验感,超越当下社会学研究的去历史化和去精神气质化的现状是有积极意义的(渠敬东,2015;周飞舟,2016;应星,2016)。由此可见,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理论化和体系化的任务还非常艰巨。

三、中国特色社会学学术话语建构的历史担当

习近平同志讲话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等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我国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国,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在世界上都是排在前面的,但目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一项极具挑战性、创造性的繁重任务,需要不断积累、不断拓展,聚沙成塔、久久为功。习近平同志讲话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形态,是古往今来各种知识、观念、理

论、方法等融通生成的结果。我们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融通各种资源,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要善于融通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要既向内看、深入研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又向外看、积极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既向前看、准确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趋势,又向后看、善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这些讲话思想中充满了继承和创新的辩证关系,可以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过程,也是对如何认识、如何反思、如何积淀、如何创新的理论与方法问题不断予以回应的过程。

中国社会学者要肩负起其学科体系构建的历史任务,需要依赖其学术话语体系的支持。因此,很有必要建立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核心在于形成自己的话语影响力。对于社会学而言,没有学术话语体系,就谈不上话语影响力的建设,但我们的话语体系不能自说自话,要吸收世界上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要超越他们,而这项工作对学术研究的方法论或推论逻辑以及使用它们的研究者会提出很高的要求。长期以来,社会学界在学术话语构建上做了不懈努力,但依然没有真正摆脱以西方为中心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强势影响,究其原因,既来源自西方学术话语霸权,也囿于自身学术体制、学术意识以及学术实践的制约而难以创新(秦宣,2012),学术界和学者难以摆脱西方话语应用于中国研究的路径依赖。因此,要构建中国社会学学术话语体系,掌握学术话语主导性,就必须着眼于本土性的学术理论与方法论的形成,既要反思性地、批判性地吸收国际学术界的前沿理论与方法,更要以建设性、开创性的姿态从中国实践出发,将其转化为本土学术话语创新的有益资源。“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习近平,2016)。

构建社会科学的学术话语体系的基础在于对本土实践的原创性理论解释。有研究者认为,西方社会科学学术话语系统近百年来形成的思想理论分门别类地专业化、学术化,其意识形态得到了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的支撑,但其根基始终在于对西方社会变迁的历史观察(寒竹,2016)。与之相对照的是,无论是在解放前中国社会学的早期发展中,还是在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学的恢复重建中,中国社会学都依赖于西方社会学,既难以合理解释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迁,又缺乏与国际

学术界进行实质性交流和对话的能力(郑杭生、黄家亮,2012)。

由此而论,中国社会学有必要形成能够紧贴本土快速变化着的社会转型实践的方法论,而这一方法论的构建并不完全排斥源自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反而要善于吸收国际前沿的研究工具,并在批判与反思的基础上加以创造性转化和利用,使其能够服务于本土化社会分析,应用于解决中国本土经济社会实践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当前,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中国社会学实现“弯道超车”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我们具有自己的优势,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认识到并且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真正建立起中国社会学人的学术自信(罗玮、罗教讲,2015)。目前,我国社会学在社会转型的重大问题上的学术研究还较为碎片化,很需要整合相关科研力量进行学术攻关,而且在开展这些学术攻关时,要将当下与历史相结合,把制度与文化相结合。

当然,作为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基础性工作,还需要依赖相应的学科体系,包括师资队伍和人才培养,学科体系建设上不去,教材体系就上不去,而要培养出好的社会学人才,就要有好的教材,将这些要素串联起来的关键在于教育方法。正如费孝通(2010)所言,我们不仅需要培育专业的有社会担当的研究队伍,更需要培养出一个学科来积累和传播这门知识。当年率先唤醒中国学术界打破西方学术霸权、建构本土话语意识的吴文藻先生,就是从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学教学和科研体系开始,从编写中国化的社会学教材开始,运用本土话语来进行教学和研究,从而培养出费孝通、林耀华、杨庆堃等著名学者,开创社会学的“中国学派”的(吴文藻,1987)。社会学重建以来,中国社会学人也强烈地意识到中国社会学研究必须要回答、讨论和解决中国面临的真问题(陆学艺,2013)。今天,中国社会学处在历史上难得的好时期,这个时期应该而且极有可能产生植根于中国土壤的伟大思想。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学科体系的构建、人才培养、教材体系和教学方法的建设,并由此推进中国社会学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

四、小 结

习近平同志讲话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核心要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

性问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中国老一代社会学家把社会学视为一门服务人民的社会生活的学问,是做人、治学、救国融为一体的学问,使广大人民对自己的社会具有充分的知识,能按照客观存在的社会规律来安排他们的集体生活,去实现他们不断发展的主观愿望(费孝通,1980)。这样一个学术传统,与习近平同志讲话精神是一致的,这也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学术话语体系的根本出发点。

当然,知易行难,在社会思潮复杂化、价值观多元化的情况下如何把握和引导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是一个需要极大付出的艰巨工作,这个艰巨性也许会超出学术话语体系构建本身。惟有中国社会学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叮嘱,既抬头看路,保持高度的文化自觉和自信,又埋头拉车,开展扎扎实实艰苦卓越持之以恒的经验和理论研究,中国社会学自身的学术话语体系建设才能最终结出沉甸甸的果实。

参考文献:

- 边燕杰主编,2002,《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董云虎,2016,《努力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学术月刊》第4期。
- 费孝通,1980,《迈向人民的人类学》,《社会科学战线》第3期。
- ,2010,《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
- 高柏,2016,《2016:后全球化时代的开始?》,《华夏时报》1月11日。
- 寒竹,2016,《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正逢其时》,在上海市委宣传部召开的“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理论研讨会”上的发言。
- 黄宗智,2005,《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 ,2007,《连接经验与理论:建立中国的现代学术》,《开放时代》第4期。
- 金耀基,2016,《中国文明的现代转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 李培林,1992,《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
- ,2007,《东方现代化与中国经验》,《社会理论》第1期。
- ,2008,《现代性与中国经验》,《社会》第3期。
- 李强主编,2008,《中国社会变迁30年(1978-200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李友梅等,2008,《中国社会生活的变迁》,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李友梅、徐中振、陆铭主编,2009,《市场 社会 政府——共和国60年发展理论解读》,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李友梅、黄晓春、张虎祥等,2011,《弥散与秩序:制度与生活视野下中国社会变迁》,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陆学艺,2013,《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建设》,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罗玮、罗教讲,2015,《新计算社会学:大数据时代的社会学研究》,《社会学研究》第3期。
- 秦宣,2012,《坚持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人民日报》11月28日。
- 渠敬东,2015,《返回历史视野,重塑社会学的想象力:中国近世变迁及经史研究的新传统》,《社会》第1期。
- 渠敬东、周飞舟、应星,2009,《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
- 孙立平,2000,《“过程—事件分析”与当代中国国家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厦门:鹭江出版社。
- ,2005,《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社会学研究》第1期。
- 孙立平、郭于华,2000,《软硬兼施: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的过程分析——华北B镇定购粮收购的个案研究》,《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厦门:鹭江出版社。
- 吴文藻,1987,《〈社会学丛刊〉总序》,《社会学丛刊》甲集,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 吴晓明,2011,《论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自主建构》,《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 习近平,2016,《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北京:人民出版社。
- 肖瑛,2014a,《从“国家与社会”到“制度与生活”:中国社会变迁研究的视角转换》,《中国社会科学》第9期。
- ,2014b,《社会学研究的历史转向》,《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第10期。
- 肖瑛、曾炜,2007,《中国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挑战、危机和超越的寻求》,《社会》第2期。
- 谢立中,2007,《结构—制度分析,还是过程—事件分析?——从多元话语分析的视角看》,《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 应星,2016,《“把革命带回来”:社会学新视野的拓展》,《社会》第4期。
- 张静,2007,《基层政权:乡村政治诸问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郑杭生,2011,《学术话语权与中国社会学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 ,2012,《促进公平正义:社会建设的本质》,《光明日报》10月17日。
- 郑杭生、黄家亮,2012,《“中国故事”期待学术话语支撑——以中国社会学为例》,《人民论坛》第12期。
- 周飞舟,2016,《论社会学研究的历史维度——以政府行为研究为例》,《江海学刊》第1期。
- 周雪光、练宏,2011,《政府内部上下级部门间谈判的一个分析模型——以环境政策实施为例》,《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
责任编辑:闻翔